

试析张季鸾报刊思想的传统原动力归属

谭泽明

摘 要：张季鸾的报刊活动主要集中于新记《大公报》时期，报刊思想主要包括“‘四不’方针”、“文人论政”和“报恩主义”三个部分。张季鸾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影响，养成了其特有的文人办报气质，成就了新记《大公报》的辉煌传奇。张季鸾主笔《大公报》言论的成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滋润和影响的结果，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原动力驱使与策动的结果。

关键词：张季鸾；报刊思想；传统原动力

作者简介：谭泽明，男，助理研究员。（广西大学 党委组织部，广西 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21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3）04-0058-05

张季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人、政论家，自1911年参加《民立报》工作，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30年的记者、报人生涯。张季鸾怀抱救国理想，奉行“四不”方针，一生笔耕不辍，为报界留下了珍贵的政论文章。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纯洁报人，他仗义疏财，高洁自立，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尊敬和认同。张季鸾是转型时代中特立独行的人，他的报刊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原动力的影响，体现了中国报人独特的精神气质。

一、报刊活动概况

张季鸾的报刊活动阅历最早可追溯到1908年，之后，他曾在《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担任主笔、编辑或记者工作，直至1926年主笔新记《大公报》。张季鸾一生报刊活动可分为三个时期。

（1）早年留学时期。1905年，张季鸾经学台沈卫保举，选中为官费留学生留学日本，先入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期间，与同乡井勿幕交友甚好，业余时间被委任主编陕籍留学生出版物——《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在此期间，张季鸾曾与于右任相识，并接受于的约稿请求，为国内报纸寄稿。《夏声》于1908年2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名义为“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的学术研究刊物，实为除旧布新、推动革命的宣传工具^[1]。该刊在日本印制完成，然后转寄国内进行分销，在国内各省设立了“代派所”，运到陕西的由西安公益书局代销，共出版9期。^[2]

（2）归国初期。1911年初，张季鸾回到国内，出任于右任创办的上海《民立报》编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由于右任推荐，张季鸾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期间，他曾及时向上海《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情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3]未几，张季鸾随孙中山去职，陆续在《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等报刊从事主笔、编辑等工作，期间还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和段祺瑞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当局，两番入狱。

（3）新记《大公报》时期。1926年6月，34岁的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在天津组建大公

基金项目：2012年广西高等学校科研立项项目《晚清民初新闻史的特殊性研究》（201204LX012），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民国元年办报高潮的特殊性研究》（XGS120001）的成果。

报馆股份有限公司。是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问世。自此开始，《大公报》进入张季鸾笔政时期，直至病逝，在中国新闻业发展史上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张季鸾倾其所有感情于《大公报》言论和编辑，专心于报刊文字工作。在病逝前18天，他还在指导编发《大公报》社评《我们在割稻子》。他生前没有出版任何文集，逝世后由大公报馆编辑出版《季鸾文存》，曾四次再版。该文集共收录张季鸾生前发表的社论170篇，附录7篇。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民国丛书》，收录该书。

二、报刊思想和主张

张季鸾一生以报人自居，舍身为国，以纸笔为媒介，传递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长达30多年的办报生涯和始终如一的报刊思想主张，一直为新闻研究者所乐道，尤其是主笔《大公报》后的社论和报刊思想，是中国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的一笔宝贵财富，集中代表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简要总结归纳张季鸾的报刊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四不”方针。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第一版，刊发了张季鸾撰写的《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办报的总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是张季鸾报刊思想的主要概括，集中体现了其办报的方针准则。“不党”就是不与任何党阀派系发生联系，“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4]，远离政治漩涡，避免卷入党派之争、派系之争；“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4](3)}，力求言论独立，摒弃当时盛行的收受“津贴”的社会不良风气；“不私”就是不图谋私利，持公民立场，“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4](3)}，建成为公共的舆论空间，效仿英国《泰晤士报》；“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4](3)}在沪版《大公报》创刊之际，张季鸾重申了“四不”办报方针，“将继续贯彻其10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5]。在张季鸾在世期间，其报刊思想主张始终如一，《大公报》的品格始终未变。

(2) 文人论政。中国近代报刊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诞生于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历史人物，其办报的主体也多是文人和知识分子。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修齐治平，香港中文大学的李金铨教授就认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族倾向，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6]这已经成为一种数千年未曾变化的普通的民族习性。关于报刊的性质，张季鸾说，“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5](366)}。言外之意，中国报刊首要的性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事业的媒介工具。在国家和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年代里，张季鸾认为，“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7]可以说，“文人论政”是中国报刊体现中国报人精神的特殊方式，即重清议和建言，而不参与政治，力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张季鸾将《大公报》同人打造为职业的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5](366)}，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有论者就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8]胡政之在《季鸾文存》序言中说，“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认为“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3) 报恩主义。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期间，在许多场合表达了这一人生观。他始终抱着回报社会的思想意识，立足本职工作，忠于国家和人民，充当公民喉舌。在《归乡记》中，他曾概括了报恩思想：“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7](8)}张季鸾对报恩思想进行了拓展和升华，由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民族祖先之恩。张季鸾认为这种思想是“很对很需要”的。同时，他也认为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必一律，只“希望大家都亲亲而仁民，推广骨血的至情，涵养爱人爱国的挚感”^{[7](10)}，他自己则是一直强调“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这一人生

观反映了朴素的中国传统士子情怀,忠君爱国之情。为报恩而忠于道德、忠于职业、忠于理想追求,处处树立报人典范。

三、儒家思想影响

张季鸾的报刊思想深刻地受到儒家传统影响,这与其早年所受教育分不开,特别是幼年的家教和青年时期接受的关学思想,使其对儒家传统忠孝思想有了深入骨髓的认知。

(一) 幼年家教的影响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从小受到齐鲁文化滋养。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早年习武,后弃武从文,考中晚清进士,官至知县。可以说,张季鸾幼年生活在一个传统士子家庭。1900年,张季鸾不幸幼年丧父,其母带兄妹三人历尽万苦,扶柩西归,返回到祖籍陕西榆林地区。

作为传统士子子弟,张季鸾幼年所受教育仍停留在旧时代。10岁左右,张季鸾“四书五经都已读熟,还常常爱问国家大事,也不时把他藏的顾亭林、黄宗义、王夫之的著作翻看。”^[9]父亲张楚林“清廉刚直”,没有遗留下什么家业,凸显了旧时文人两袖清风的风骨气度。在《归乡记》中,张季鸾说“父子两代,没有增加过财产,只有减少些”,以至于“现在所住的一院旧屋,还是乾嘉时代的祖产”。张季鸾去世时,亦未给家人置办什么产业或财产,可见受其父之操守的影响至深。此外,张母青年孀居,深明大义,含辛茹苦操持家业,坚持送孩子读圣贤之书。这种恪守传统妇道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季鸾的思想。在遗嘱中,张季鸾也说:“至关于余子之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追根溯源,我们能从张季鸾的幼年经历发现其之后的行为选择。

这段幼年正统的家教培养和痛苦经历,让张季鸾思想和心迹不同于一般的留洋知识分子。传统的思想文化意识深刻烙在心间,奠定了其以后的基本人生态度,尊敬长辈,关心国是,存感恩之心、仁爱之心等成为以后的做人准则。张季鸾的独子大名唤作“士基”,似乎印证了其传统士子的情结。

(二) 青年关学思想的影响

青年,是一个人思想逐渐成形的重要时期。年轻的张季鸾曾先后在榆阳书院、“烟霞草堂”、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就学。在“烟霞草堂”求学时,他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获得真传。后来,他又追随刘古愚到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学习,打下比较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奠定了坚实的国学修养和浓厚的儒学情结。

关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分支,发源于陕西境内,主要代表人物是宋代的张载。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学说,特别强调“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躬行礼教”等,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其最著名的格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具有包括宇宙、吞吐八荒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冯友兰先生认为其概况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

作为关学余脉的刘古愚是晚清关学大师级人物,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在维新变法中,社会流传“南康北刘”之说。并且,刘古愚对自己的学问并不守旧,而是主张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身体力行印证了“经世致用”、“笃行践履”的思想宗旨。有研究者已经指出,以后接受关学思想影响者,“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板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10]。刘古愚一生践行和传播关学思想,培养出于右任、吴宓、张季鸾等民国众多优秀分子。

张季鸾在师从刘古愚学习期间,思维敏捷,刻苦用功,颇受赏识。在人生学识增进的重要时期,张季鸾深受关学思想的滋养,无形中养成了具有高尚情操和伟大抱负的良知知识分子。纵观张季鸾30多年的报业生涯,处处彰显了关学思想的影子。笔政新记《大公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他站在

独立立场，启蒙思想，救亡图存，极力呼唤社会良知，渴望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善尽新闻记者天职”，“期对于国族有所贡献”。同时，在言论写作中，对符合民族大义的人物、事件等不遗余力赞颂，如歌颂马占山：“马将军与所部将士之苦节忠心，则已永共民族生命以不朽”。^[11]

四、儒学的传统原动力归属

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行为，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12]。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是这种伦理的维护者，同时也是这种伦理的实践者。儒学思想历史嬗变悠久，内容体系庞杂，本文无力深究亦无意深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与少年即留洋海外的大多数青年留学生相比，张季鸾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征，展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独特气质。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和主张，以及“文人论政”的办报行为，是源于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的原动力，即其报刊活动的最原始动因。这种儒学传统原动力不仅驱动其文人论政的精神思想，同时驱动其文章报国的实践行为。

（一）精神层面：儒家知识分子的潜意识追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始终拥有胸怀天下的品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意识促使其对于国家大事予以诸多关注，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13]，可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有研究者就认为，“千百年来，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儒家的原则为依归，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怀”^[14]。这一情怀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可以说是属于精神信仰层面的，是任何外在力量都难以改变的。这也是中国近代报人不同于欧美报人的一个不争事实。

作为受过儒学思想浸染，聆听过关中大儒刘古愚亲自教海的张季鸾来说，其精神思想中已经深深烙下儒学印痕，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其所接受的关学，“以‘气本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以注重气节、主张‘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学风，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与强调心性净化的心学在关学中有机融合”。^[15]其一生的活动都反映了这种追求，所以才有被公众接受并认可的春秋笔法。在言论写作中，张季鸾呼吁：“相信我们每一个读者，都是贡献其一切于国家，都守其岗位，忠于工作。”^{[5] (361)}他本人也一直强调“要公要勇要诚”，认为办报成功的秘诀就是“曰忠曰勇”。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关注着国家命运，对国家前途命运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在遗嘱中，他说，“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这一心迹表露真有“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味道。只可惜，张季鸾并未等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消息，便因病去世，终年仅仅 53 岁，令人扼腕。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可以说是对他人人生恰当而中肯的评价，是对他精神思想和价值追求的最好肯定。

（二）行为层面：经世致用思想的践行运用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积极入世的共同行为特征，“自任以天下之重”。这正如孟子所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一个军阀混战、政权不统一、随时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民族独立作出贡献是每一个士子的本能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

张季鸾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同时面临内忧外患。内不能完全启发民智，建立完成统一的独立主权国家，民生凋敝；外不能有效抵御帝国入侵，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沦丧。这种特殊历史状况，让一介文人的确十分焦虑和无奈。张季鸾公开疾呼：“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11] (30)}他在报刊活动中，时时思考服务国家事业、民族大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不忘记批评和反省自我，“自己觉得在报界多少年，眼看着国家地位至此，还在做记者，实在没有面子”^[16]。

张季鸾在言论写作中从不忌惮权势。主笔新记《大公报》，张季鸾发表了著名的“三骂”文章，独

立不羈，超然物外，有理有据有节，以至于蒋介石每日必读《大公报》，了解国情輿情。张季鸾的言论始终关注民众启蒙。他积极普及民主民权知识，启发民智，进行思想输入，利用报刊阵地与青年探讨人生问题，探讨妇女民权问题等，可以说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的特质，并兼有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思想”^[17]的人。张季鸾写文章论政从不受任何势力左右。他论政但不干政，“向以办报为职业，不兼任何政治上任何职务，不作求官求差之任何活动”^{[4](59)}，始终持知识分子中间立场，避免受到政见、党派的干扰，努力发出真挚的、公平的声音。

五、结束语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张季鸾是始终以报人身份守护精神追求的重要新闻人物。他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浸润，养成一身浩然之气，是新闻界的一个楷模。周恩来认为他“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于右任的评价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虽然，“由于中国伦理道德正统观念的影响，中国文人又把自己政治思想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身上。”^[18]张季鸾并未超越历史，依然寄希望于社会最高统治者，但却从精神思想上传递出中国传统原动力推动历史进步的事实。“一种文化中最习以为常的部分往往隐藏着它最本质的密码”^[19]，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和行为反映了中国这一隐秘的动力：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动力。中国这一传统原动力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一种舍己为家、舍己为国的浩然之气，是民族精神和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潜在的传统原动力的驱使和策动，才有了民族国家的前进与复兴，是中国力量得以加强的精神原动力。

参考文献：

- [1]李福荣.风雨沧桑话《夏声》[J].新闻知识,1992(2):43.
- [2]王公望.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的刊物——《夏声》[J].兰州学刊,1984(3):84.
- [3]《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新闻界人物(一)[Z].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07.
- [4]方蒙.《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大事记实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
- [5]张季鸾.张季鸾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243.
- [6]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A].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
- [7]张季鸾.季鸾文存(下)附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9:30.
- [8]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02.
- [9]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J].今日中国:中文版,1984(8):68.
- [10]李廷华.“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J].书屋,2003(1):63.
- [11]张季鸾.季鸾文存(上)[M].上海:上海书店,1989:58.
- [12]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迁[M].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6-17.
- [13]李云豪.浅谈传统思想对张季鸾报业活动的影响[J].科技信息,2007(31):311.
- [14]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J].社会科学家,2010(1):106.
- [15]刘澍涛.试论关学对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影响[J].今传媒,2006(8):59.
- [16]张季鸾.我们有什么面子[J].国闻周报,1935(4):1.
- [17]李瞻.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J].国际新闻界,2010(9):108.
- [18]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3):58.
- [19]姜红,於渊渊.从“名士”到“报人”:近代中国新闻人职业身份认同的承续与折变[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211.